



任胜洪 张兆惠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存量改革开始取代过去的增量改革,并从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结构的内涵式发展。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构建优质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作为集“刚性”制度保障和“柔性”价值约束于一体的质量保障手段,是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改进和提升的生命土壤,更是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2021年1月,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首次将“质量文化”列为审核指标,高等教育质量文化逐步成为指导高校进行质量建设的重要依据。当前,进一步推动优质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形成,可以从以下四条路径着手。

由“管理过度”回归“育人本位”

当前,一些高校为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并激励师生员工,引入了基于结果导向的评价制度。该制度在以效率、竞争、绩效为核心的价值导向指引下,通过刚性的制度手段对师生的行为施加约束。尽管这种基于结果的评价制度有利于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率,但实践领域用升学、论文、“帽子”、分数等客观数据来衡量教育价值的方式使得教育教学实践过于偏重指标本身,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以及这些指标实现过程中的一些有教育意义的结果,阻碍了育人功能的有效发挥。

高校办学要树立“育人至上”的教育观,坚持把立德树人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积极摆脱“短视化”思维,关注人的个性、创造性、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和综合素质,为人的长远发展和持续性发展做好准备。还要树立“以爱育人”的人才培养观和教育教学管理观,在刚性制度保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柔性化的人文关怀,关注师生的生活需要、个性需求和心理健康,带着感情、温度和诚意耐心回应师生的急难愁盼,为师生发展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积极的文化氛围。

从“外源后发”转向“内生主动”

当前,部分高校推动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通常是由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带动和催生的。这种“外源”驱动下的“被动发展”所产生的后果是,少数高校缺乏质量发展的主体意识,而主动发展的内生动力才是高等教育质量长远进步最基础、深沉和持久的动力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聚焦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阶段。全面激发和释放高校办学活力与内生动力,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高校要进一步明确自身在质量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树立“我要发展”的质量自觉意识,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质量动能需求从“外源后发”向“内生主动”转变。高校内部也要以信任为基础开展质量合作,通过平等的沟通对话不断强化师生员工的质量共同体意识,让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质量责任,最大限度地提升质量自觉和参与质量文化建设。

用“中国特色”超越“西方至上”

高等教育发展的初期阶段,模仿、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就如同在质量保障初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概念、理论、模式、方法和技术与国际潮流接轨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西方的质量标准和要求奉为主臬。一方面,西方的质量评价标准与我国国情并非完全适配,无法体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发展水平和特色。另一方面,西方的质量标准和要求隐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诉求。因此,不能为了“与国际接轨”而刻意用“西方眼光”来考量我们自身的发展道路和体制机制。

当前,我国正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体系是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保障。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我国高等教育的任务使命,紧密对接社会需求、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探索构建富有时代特征、体现世界水平、彰显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同时,还要培养各教育主体对我国高等教育百年本土实践的文化自觉、自信和认同,深入挖掘其中的积极内涵和价值,加快构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传播的话语和叙事体系,向世界展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发展的良好风貌,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提供中国经验,进一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由“高度同质”走向“个性多样”

个性化、多样化是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然而当前,因办学定位不清晰、加之受到单一教育评价导向和“层级观念”的影响,少数不同层次、科类性质、人才培养模式的高校,在办学目标、办学理念、组织结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等方面出现了趋同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特色质量文化建设。

高校要把准自身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紧密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学校发展历史和实际,通过差异化发展,确立自己的特色和比较优势。有关部门则要不断推进高校分类评价改革,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高校分类标准,构建多样化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引导高校科学定位、错位竞争、特色办学和多样化发展。

(作者任胜洪系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贵州省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贵州省特色教育强省战略研究团队负责人,张兆惠系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斌伟

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澎湃发展,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在此背景下,全球教育迈入了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的新阶段。而我国,则将教育数字化视为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作为我国师范教育的主力军,是衔接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重要纽带。新的历史时期,师范院校应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积极拥抱数智新时代,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的赋能作用,推动高质量未来教师教育更好地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交好“数智时代,师范院校何为”的时代答卷。

响应强国战略,把握教师教育新方向

在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师范院校应秉持“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放眼长远看教育”的宽广视野,深入探索解决培育怎样的未来教师,以及怎样培育好未来教师的难题。

明确新使命。强国建设,育师有我。师范院校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从“四有好老师”到“四个引路人”,努力培养具有教育家精神,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大国良师。

明确新站位。扎根本土,胸怀世界。我国教育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新阶段,师范院校应扎根中国大地培育教师,既要引导未来教师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又要使之具备宽广的国际化教育视野,以及对全球数智科技革命的敏锐感知,胜任未来的不确定性挑战。

明确新指向。教师所教,皆为未来。当前,我国已拥有200余所师范院校,培养出大批即将步入教师行业的职前教师,他们与专职教师共同肩负着引领未来教育的重任。因此,师范院校要重视教师职前职后一体化发展,擘画教师教育事业的顶层设计和规划蓝图,充分发挥教师教育特色和优势,成为培育“未来之师”的摇篮,为国家教育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夯实数智基建,打造教师教育新生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师范院校应当深刻把握系统规律与机制方法,将教师教育工作的规律性与数智技术的驱动力深度融合,将数智技术的优势融入培育高质量教师的全过程。

加大投入力度。升级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师范院校应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构建高速稳定的校园网络、安全可靠的云平台,以及精准专业的教育专属大模型,为教师教育的数字化生态提供技术支持。

打造全方位、多层次数智化场景。服务教师教育。师范院校应将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学、管、考、评、研”等典型场景,为教师



华南师范大学师范生正在基于智能分析报告进行学习。

吴建国 摄

在实践中提供专业发展的训练支撑。

加强数据治理。师范院校应整合多类场景中的多模态教育数据,创新教育数据要素在教师教育生态中的应用途径,在数据驱动下推动教师教育治理迈向“智治”和“善治”。

创生数智资源,丰富教师教育新供给

师范院校应建设、汇聚、创生与共享数智化教育资源,并以其为切入点,打好“人工智能+教师教育”的“组合拳”,丰富教师教育服务内容供给的数量,提升其质量。

整合盘活现有资源。鼓励教师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协同开发应用数智化资源,并对其优化设计。面对我国庞大而分散的数字资源,师范院校应发挥引领作用,携手智能教育企业与中小学校,共建共享智慧教育资源,精准推送现有优质资源,并提供个性化服务,降低教师获取资源的成本与门槛。

以智能技术创新资源服务形式。师范院校应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知识图谱等新兴技术,设计开发数字教材、多模态教育知识图谱、沉浸式训导系统、教育智能体等新型资源,为教师提供丰富多元的教学服务,以及虚实融通的沉浸式体验。

利用数智技术赋能资源提质增效。师范院校应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挖掘分析教育用户的反馈数据,精准智能地评估资源质量,推动数智资源的持续改进迭代,为教师提供更高质量、更具针对性的教育资源。

提升数智素养,应对教师教育未来新要求

师范院校应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培育未来之师。通过职前培养,促进主干学科知识与跨学科知识、扎实理论功底与强劲实践技能、专业基础能力与高阶创新能力、学科素养与智能教育素养相融通,锻造教师的数智素养。

增强教师对技术变革的“适应力”。师

范院校要将人工智能、大数据、混合现实等内容,纳入教师教育培训课程体系,帮助教师掌握数智技术的理论、知识和技能。

培养教师对技术应用的“实能力”。师范院校要培养教师将主干学科知识与跨学科知识传授给学生以及善于创新应用数智技术的能。

提升教师的技术风险“防范力”。未来教师是培育新型人才的一线育人主体,教师自身对技术伦理的认识掌控水平,将直接影响新生代“数字原住民”的技术观。师范院校要注重对教师开展信息伦理安全教育,使其成为具备良好数智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未来之师。

推动数智实践,探索教师教育实训新样态

师范院校应将教师教育工作深深植根于数智化的基建环境与实践场景中,培养既能熟练掌握智能技术,又能够运用人工智能,为未知而教、为未来助学的新型教师,以及新时代教育教学变革的创新者。

加强对教师教学方法的指导。师范院校应鼓励教师基于场景,推动数智技术和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有效模式和实践策略,在实践中提升他们的智能教育教学胜任力。

加强数智化教学创新的实践研究。师范院校应鼓励教师基于新技术和新资源,开展教育教学创新探索,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帮助他们发现并解决教学新问题。

加强测评与数字画像。师范院校应通过多来源、多粒度、多模态数据,准确分析与挖掘教师的过程性、个体性、群体性特征与需求,为教师持续学习与专业成长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导,促进教师提升教学能力。

优化数智机制,激发教师教育新活力

师范院校应健全适配机制,以数智技

发展新质生产力 高校大有可为

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傅方正 章舒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近年来,浙江大学遵循“立足浙江、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总要求,秉承“以服务求发展、用贡献求辉煌”的办学理念,扎根浙江大地、汇聚地方资源、反哺区域发展,走出了一条以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为特色的道路,坚定了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

构筑最优人才生态

人才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最积极、活跃的要素。在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中,高校要聚焦区域战略定位和功能特征,结合区域人才队伍建设的现实需求,坚持引育并举,突出“为我所用”,构筑最优人才生态;还要加强国际交流和校地合作,根据不同层次、领域、产业需求,广泛吸引和培养各类急需人才,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重要智力支持与人才支撑。

学校持续推进创新人才汇聚,引育志存高远、能担大任的拔尖创新人才,助力浙江省“三支队伍”建设。一是积极响应海洋强国战略,发挥学科综合优势和海洋区位优势,在舟山市建设浙江大学海洋学院,围绕海洋领域创设交叉学科,培养高层次海洋人才。二是为区域产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是衢州市共建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和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衢州分院,一

手抓创新人才培养,一手抓产业人才引进,造就了一支面向新材料领域的高素质劳动者队伍。三是打造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与海宁市共建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开展在地国际化人才培养,以全球视野推动人才成长;与义乌市共建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开展医学特色人才培养,以开放的胸怀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

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

科技创新是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在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中,高校要发挥基础研究主力军和科技新生力量的作用,围绕区域产业集群建设,链接产业发展所需创新要素,当好科技创新“策源地”和“动力泵”;要探索校地合作模式下的有组织科研,联动地方科研机构,建设重大产业创新平台,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完成从“书架”到“货架”的关键一跃。

学校努力成为区域发展的创新排头兵,协同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共建各种形式的创新联合体,服务浙江省“315”科技创新体系工程建设。一是聚焦“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与台州市共建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打造智能制造领域的省级技术创新中心,提高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供给能力,助推台州制造业做大做强。二是以产业技术需求为导向,与金华市共建浙江大学金华研究院,专注前沿领域的技术研发、人才引进和高科技企业孵化,响应金华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产业需求。三是以产业中试平台建设为切入点,与绍兴市共建浙江

大学绍兴研究院,建设紧贴集成电路、高分子材料等领域的产业创新平台,整体提升区域产业的科技竞争力。

探索新型生产关系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在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中,高校要积极整合各类资源,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和资金链“四链融合”,围绕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深入探索成果评价、绩效考核、收益分配、科研管理等方面的改革举措,为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环境与改革动力。

学校着力转变服务社会方式,以体制机制之“新”,提升创新效能之“质”,充分融入浙江省三个“一号工程”建设。一是创新校地合作模式,强化有组织的社会服务。积极与省内各地市联动,打造一批能切实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的高能科创平台,打破以往学科“力量分散、单打独斗”的局面。二是优化创新要素配置,因地制宜推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与杭州市共建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整合政府政策、企业市场和高校科技优势,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设计、发展的创新综合体,实现科技与产业“双向奔赴”。三是探索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科研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与嘉兴市共建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打通创新成果转化关键节点,建立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到成果转化的创新链

条全生命周期成果转化试验平台。

打造校地合作样板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兴产业是关键。在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中,高校要聚焦未来产业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产业协同和创业孵化,加强与行业龙头企业的科研合作,促进科研设备共享和人才队伍共用,助力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应用转化;要推动高校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着力打通科研成果与新兴产业、新模式对接的难点、堵点,解决高校科技成果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学校充分发挥学科资源优势,结合地方城市产业需求导向,实现学习、产业、创新“三城”功能要素深度融合,打造“名城+名校”的校地合作典范样板。一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与丽水市共建浙江大学龙泉产业创新研究院,聚焦新能源热管理和低碳环保燃煤等重大点,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加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湖州市共建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围绕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用智能创新技术探索“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双向赋能,打造产学研一体转化的新路径。三是布局发展未来产业,与温州市共建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以院士为首席科学家,以新材料产业为抓手,以市场化机制为牵引,探索“浙大科创+温州市场+政府支持”的发展模式。

(作者傅方正系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章舒帆系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